

游山西运城·读华夏历史

河东探“宝” 56

廉洁自持 忠信是仗

——感悟柳宗元纪念馆

□ 祁世坤

永济柳园是继广西柳州柳侯祠、湖南永州柳子庙之后又一个以柳宗元文化为内涵的主题公园，如今的柳园又经打造成廉洁文化主题公园。园内的柳宗元纪念馆，是它的文化核心。

纪念馆内的柳宗元大殿匾额为“民惟邦本”，用以彰显柳宗元的民本思想。进入大殿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组“吏为民役”的柳文摘句：夫为吏者，人役也；盖为民役，非为役民；率性廉介，怀贞抱洁；清白可鉴，淡泊是师；廉洁自持，忠信是仗等。由这样的诗句，又引出一串感人故事。

吏为民役是柳宗元身为青年朝官时提出的观点，语见其《送宁国范明府诗序》，“夫为吏者，人役也”。他南贬永州，在《送薛存义序》中，将这种思想得到完整的表述：“凡吏于土者，若知其职乎？盖民之役，非以役民而已也。”他对薛存义说了一番肺腑之言，意为凡是在地方上做官的人，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？他们应该是老百姓的奴仆，而不是来奴役老百姓的。老百姓种地，每年要拿出十分之一的收成交租税，作为官吏的俸禄，这就是要官吏来为他们办事。一些官吏拿了老百姓的钱，却不为他们办事，还要敲诈勒索老百姓。这好比是主人家雇用的仆人，得了佣钱，却不为主人干活，还要偷盗主人的财物，这能不让人发怒吗？如今的官吏多是这样，就是因为他们有权有势。面对这种现实，柳宗元一腔愤慨。

找到薛存义这样的典型，使他大喜过望。他在永州，河东同乡薛存义也在这里。薛存义原先为湘源县令，颇有政绩，因零陵政令混乱，赋税扰民，老百姓告到州府，州府应急，又改派他到零陵县。老百姓真是遇到了好官，打官司得到公正的处理，纳税有了公平的负担，跑出去的人又返回



▲ 柳宗元纪念馆

家乡，拒缴租税和逃避劳役的人，都在一个月内办清了手续，坏人和贪官也都受到惩罚，老弱之人不再受人欺侮，这些都能从人们的脸上看得出来。薛存义在零陵县令任上已经两年了，因为工作变动，又要离开零陵，柳宗元来到江边为他饯行。他感慨薛存义为官一方，没有白拿老百姓的税钱，确实是造福于民，受之无愧。在柳宗元纪念馆里，你能切身感受这一故事情节的魅力。柳宗元看重的是薛存义身上体现了“民役之吏”的勤政和廉洁。柳宗元用这一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，生动具体地诠释了吏为民役的思想。

柳宗元赞赏薛存义，何尝不是他自身的作为。他在永州，是“俟罪非真吏”，是“谬人”，是“縲囚”，不得参政，但他亦然关注着吏为民役的思想和践行。他处境堪忧，保持洁身自好。正如《瓶赋》中写的“钩深挹洁，淡泊是师。清白可鉴，终不媚私”。他深入乡间，体察民情，写出了如《捕蛇者说》《田家》等诸多诗篇，以至发出“赋敛之毒，有甚于蛇者”“故为之说，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”为民请命的呼声。

“十年辛苦久已劳”的柳宗元，终于得诏回京。然而不想又是当头一棒，二次南迁，他被贬柳州，好友刘禹锡被贬播州，便有了史上著名的“以柳(州)易播(州)”事件。

播州，即今贵州遵义，当时环境恶劣，刘禹锡还要带上八十岁的老母同往。柳宗元甘愿为难友解忧受过，惹得皇帝不悦，后刘禹锡得改派。他仍发柳州，虽为刺史，说是“官虽进而地益远”，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惩罚，诚如他以往自感的“于众党人中，罪状最甚”。他到柳州，已是百病缠身，况柳州正如他的朋友吴武陵为他抱打不平的一样，“西原蛮未平，柳州与贼犬牙，宜用武人以代宗元”。然而，他一介文士又以一方军政大员身份，日夜苦劳，鞠躬尽瘁。

柳宗元四年政绩卓著，被人们誉为“四大政绩”，即废除奴俗，解放奴婢；破除迷信，去鬼息杀；开荒凿井，

发展生产；修复孔庙，兴办文教，其中显然有着他当年“永贞革新”思想理论的实践。

他廉洁自持，为官清正。他移风易俗，组织打井取水，改变百姓不卫生的饮水习惯。在《井铭并序》立石文中，一一列出投工用料的明细账目，如“凡用绢布六千三百，役用三十六，在砖千七百，其深八寻又二尺”，公示于众，以表清白。

他对自身同样苛求，还在永州时，《上湖南李中丞干廩食启》一文中写道，因为自己遇到荒年，难于度日，不得不低头向上司乞求廩食。只此一点，也足见他平日生活的窘状。他在柳州去世后，家无积蓄，家人无力治丧，灵柩停放在他生前喜去的罗池之处，等到第二年，还是身为上级桂管的河东同乡裴行立和挚友刘禹锡筹措丧葬费用，才得以让他归葬长安祖茔。

柳宗元在柳州期间，面对乡俗，适从民意，大旱之年，亲自主持雷塘祈雨。在这一仪式中，他在大庭广众前以自己的人格向苍天发誓，“神惟智知，我以诚往”“廉洁自持，忠信是仗，苟有获戾，神其可罔”。即表白诚心实意祭神祈雨，为人处世忠信廉洁，如有罪过神明也不饶恕，甘愿受上天的惩罚。他言行如一，以身作则，当是已有誓言在先。

往事越去一千二百年。柳宗元所处的时代，由于历史的局限，他的“吏为民役”和我们说的“人民公仆”有着本质的区别。他的本意所指的当官要为民作主，也不同我们今天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概念，但他的睿智卓见和思想境界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。难能可贵的是他那种身体力行始终如一的精神，更是令人肃然起敬。

古人有说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，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，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。我们在柳宗元纪念馆里，自当会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悟。对着这面镜子，我们重温历史，从中感受着经验教训；我们从古人的身上，又该得到多少启迪。

河东记札

包拯与运城盐政“钞引法”

□ 胡春良

说起中国历史上的清官，人们往往会想到包公，在民间还会加上“黑脸”二字，叫“黑脸包公”。戏曲脸谱经常用黑色象征历史人物的刚直不阿、铁面无私等崇高品性。说起包公，他还与运城盐池、盐运有关呢。

运城是一座因盐而建的城市，号称“盐运之城”；池神庙是全国唯一一座祭祀“盐池之神”的庙宇，是始自唐代的国家祀典庙宇。池神庙有着丰富的文化遗存，海光楼就是其中一处著名的建筑。海光楼面向中条，俯瞰盐池，巍峨壮美。楼前有一副著名的旌表联：“常平乃关壮缪故里辖其民也，理应忠心报国；解池本包孝肃旧制治此豷者，首当铁面无私”。楹联的作者是明代的喻时，意指常平是关公故里，在这里为官就应该像关公一样忠心报国；解州盐池是包公工作过的地方，治理盐业就应该像包公一样铁面无私。

那么，包公与运城及运城盐池有什么渊源呢？包公是人们对北宋名臣包拯的敬称，其以清廉公正、铁面无私闻名于世。他的形象被后人不断演绎，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塑造，衍生出许多轶事传说，有小说《包公案》《三侠五义》，戏曲《陈州糶米》等。

包拯与运城盐运，源自一桩公案。北宋庆历六年，河东盐池主理盐政的大常博士范祥变盐法，推行“钞引法”，亦称“盐钞法”。废除旧盐务管理体制，改革利益分配办法，使坐商与行商分家，这意味着产、销趋向专业分工方向发展。因推行新法触动了旧时盐务官吏和当地豪商绅绅、巨商富贾等的既得利益，范祥就成为他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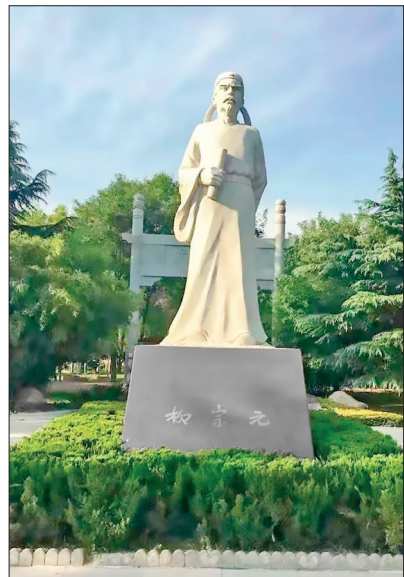
黄庆霖是范祥的左膀右臂，他协助范祥倡导和推行“钞引法”。那些阻碍“钞引法”推行的既得利益集团，少不了受到黄庆霖的指责和打击，他们认为除掉黄庆霖，范祥就势单力薄无能为力，“钞引法”就会半途夭折。

机会很快来了。河东盐池盐务当时由陕西转运使兼管，黄庆霖到陕西巡视盐务行销情况后，返回河东盐池。当路过解州时被一伙不明身份的暴徒用绢带勒死，抛尸于解州黑龙潭旁边，其状惨不忍睹。此案震惊朝野。宋仁宗接报后，立即命三司户部使包拯昼夜赶赴解州，侦破此案，同时了解盐事，主盐政，大力推行“钞引法”。

包拯到解州后，立即勘察现场，开展调查走访。他和几个随从从人员轻车简从到解州周围的北门滩、硝池滩、七郎堰、黑龙潭和附近村庄的农家进行勘探和访问，确定了一些线索和疑点。

包拯等人乘小船从伍姓湖顺姚渠渠逆水而上，行至三里桥旁，看见一老妪正在拆洗新棉被。既不逢年又不过节，崭新的棉被被拆洗，这一反常现象引起了包公的注意。经过查验，棉被里子上隐约能看见血迹。包拯问老妪：“棉被上的血迹怎样来的？”老妪惊慌失措，支支吾吾，前言不搭后语。包拯命手下将老妪带回潞村衙门询问，老妪方供出她的小儿子参与移尸的事实。包拯派人连夜到解州将老妪的小儿子缉拿归案，经过审讯，供出了同犯无赖毛二、哇户赵荃，以及提供凶器的刘擅园。最后查出杀死黄庆霖的主谋是盐务旧官吏潭荣培，他不甘“钞引法”推行之后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，遂勾结原官运车后帖阮阮大成，趁黄庆霖回盐场途中将其用绢带勒死，又收买无赖毛二等人戮尸移尸荒郊野外。

后来，包拯在解州东门口召开所有坐商、行商和农户参加宣判大会，严厉惩处几名罪犯，重申推行“钞引法”。庆历新政时期，包拯任监察御史兼河东盐池盐务转运使，主理盐政。《宋史·列传七十五》载：“解州盐法率病民，拯往经度之，请一切通商贩。”由于包拯的治理颇有成效，后人感其政绩，在解州东门外为他立了一座石碑，以示纪念。



▲ 永济柳园的柳宗元塑像